

清华明德研究丛书·社会共治

丛书主编/王名 副主编/李勇

增量共治的杭州实践

INCREMENTAL CO-GOVERNANCE

A study on the practice of Hangzhou

刘国翰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清华明德研究丛书·社会共治

丛书主编/王 名 副主编/李 勇

增量共治的杭州实践

刘国翰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增量共治的杭州实践 / 刘国翰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11

(清华明德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097 - 6660 - 6

I. ①增… II. ①刘… III. ①社会管理 - 研究 - 杭州市
IV. ①D675. 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42147 号

· 清华明德研究丛书 ·

增量共治的杭州实践

著 者 / 刘国翰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刘骁军 芮素平

责任编辑 / 蒋北娟 关晶焱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社会政法分社 (010) 59367156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56 千字

版 次 /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6660 - 6

定 价 / 58.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代 序 |

关于社会共治的几点思考

获悉清华大学召开“社会共治的实践与创新”研讨会并将陆续出版社会共治系列丛书，收到并阅读了关于杭州经验、温州经验等3份书面材料，欣喜过望，借笔谈谈我对社会共治的几点思考。

—

首先，我谈谈对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撰写的社会共治研究系列报告和相关建议的看法。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今年全国两会以来，社会共治问题作为我国社会治理创新的一个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越来越受到学术界和实际工作部门的重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从今年3月起，围绕社会治理创新和社会共治问题，开展了多角度、多层次、多系统的密集研究，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形成了包括地方实践案例卷和行业经验案例卷在内的多卷系列研究报告。我认为，这充分体现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高度重视，体现了课题组同志对于推动社会治理创新和社会共治的崇高使命感、责任感和可贵的担当意识、参与意识，也体现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在这方面的研究实力。

这些系列研究报告，涉及到我国社会治理的众多空间和领域，不但覆盖面相当广，而且针对性非常强，为推进我国社会治理创新和社会共治，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经验和众多很接地气的研究成果。课题组提出的推动社会共治制度入法、推动若干重大公共领域深化改革与公共政策建设、推动若干重大领域的社会共治制度建设等建议，敏锐地抓住了当前我国社会治理创新和社会共治中的关键性问题。我相信，这些研究成果通过进一步加工完善成为政策建议，将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会对推动我国社会治理创新和社会共治产生重要影响。

二

其次，我想对搞好社会共治问题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今年3月，在十二届全国政协第二次全体会议分组讨论中，我曾简要介绍过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科学内涵的看法。我认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现代治理，其科学内涵大体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国家层面的法治国家；二是社会层面的共治社会；三是城乡社区层面的自治基层；四是广大公民层面的德治公民。这“四个治”，即法治、共治、自治、德治，是对推进我国现代治理的一种内涵细分。当然这种细分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是互相联系的而不是完全割裂的。

我还认为，法治国家、共治社会、自治基层、德治公民这四个层面的治理，在实践中都同社会共治密不可分。这也就是说，法治国家、自治基层、德治公民，从本质上说，都贯穿了一种社会共治理念。离开了社会共治，无论是法治国家、自治基层、德治公民，都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比如，在法治国家层面，我们党提出的法治国家建设的方针，即：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就充分体现了加强法治国家建设过程中的社会共治，换言之，这就是一种基于法治的社会共治。

比如，在自治基层方面，其实也包含着相当程度的社会共治。从地方实践的经验来看，比如温州的社区自治中就体现了行政力量、市场力量、社会力量的多方面参与，是一种基于社会共治的基层自治。再比如上海市在2011年就提出了城市街道层面的“社区共治”概念，就是在社区党组织领导下，政府组织驻区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社区居民等围绕共同需求、共同利益、共同目标，通过协商合作的方式提出公共服务、解决公共问题、优化公共秩序、推动社区发展。经过3年来的探索实践，目前在上海的城市街道层面，已初步形成区域化党建平台、社区委员会平台、网格化管理平台这三大服务性的社会共治平台，构建了社区街道党工委领导、街道办事处主导、驻区单位和社会组织协同、居民参与的多元主体共治的社会治理格局。上海的社区建设，其广度、深度在全国都是领先的，希望

课题组能够关注上海的案例，开展较为深入的调研并形成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又比如，在德治公民层面，同样离不开社会共治。我国社会舆论争论已久的老年人当街摔倒后该扶不该扶的问题，其实就是一个基于社会共治的公民德治问题。也就是说，解决这个问题，并非仅仅是对摔倒的老人和旁观的路人的一种道德教化、道德提升的德治问题，而是一个需要伴随有效管用的社会共治才能解决的公共治理课题。此外，解决公交车上自觉让座的问题，也是一个基于德治的社会共治课题。但是在广西南宁市，2013年9月当地政府发布的《南宁市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却试图用法治手段去解决这一基于德治和共治的公共治理课题。这同当年修订后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把家庭年轻成员“常回家看看”纳入法律范畴一样，都是混淆了德治、法治和社会共治的不同适用范畴。

同时，我还认为，社会共治作为国家现代治理的一个重要概念，虽然在我们国家出现的时间比较晚，但社会共治的理念和观念，则早就作为一种体现于我们党和国家治国理政实践中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在我国社会管理中出现了。因此，我同意课题组的看法，社会共治的概念虽然是李克强总理在今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正式提出来的。但是，社会共治的理念和实践则是早已有之的。

比如，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我国就在公安工作中提出，破除苏联的格伯乌神秘主义路线，实行人民公安特别是社会治安的群防群治；1963年，毛泽东主席又批示肯定了浙江枫桥干部群众创造的“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这一社会综合治理的“枫桥经验”，这都可以说是出现于我国的比较早的社会共治理念和观念。2003年和2013年，习近平同志先后两次就“枫桥经验”发表讲话和做出批示。他把“相信和依靠群众，充分发挥群众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力量，让社会和谐稳定，让群众安居乐业”，概括为“枫桥经验”的重要内涵；强调要充分认识“枫桥经验”的重大意义，适应时代要求，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们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以及党的十七大、十八大报告，在谈到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谐社会建设以及社会体制改革问题时，都一再强调要建立

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这种聚合广泛社会力量的社会管理格局实质上就是一种社会共治格局。

2005年2月19日，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提高依法管理社会的能力和水平，推动建立政府调控机制同社会协调机制互联、政府行政功能同社会自治功能互补、政府管理力量同社会调节力量互动的社会管理网络，形成对全社会进行有效覆盖和全面管理的体系。这个“互联”“互补”“互动”的社会管理网络，实质上就是一种体现社会共治理念和观念的社会管理体系和社会共治体系。

2011年5月30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央政治局研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问题会议上的主持讲话中明确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要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为先，多方参与、共同治理”。这里提出的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共同治理”概念，表明我们党早在3年前已接近于提出社会共治理念。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加快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等重要思想观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还明确提出，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这些重要思想观点，都是在强调要建立和完善同我国市场化、民主化、现代化相适应的国家治理现代化。

总之，我认为，推进包括社会共治在内的国家现代治理，既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加快我国社会向现代化转型的制度保证。提出推进国家现代治理的战略任务，表明我们党已经从理论和实践的結合上深刻认识到，天下大乱不能达到天下大治，天下常斗不能达到天下大治，只有天下大定，也就是国家政治稳定、社会稳定、制度稳定、治理稳定，才能真正达到天下大治。

三

最后，我想对完善和充实社会共治系列研究报告提出几点意见和建议。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共治研究课题组的《社会共治研究系列报告》，从大量地方实践中，选择了若干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模式，包括杭州市的“增量共治”、温州市的“推位让治”、成都市锦江区的“借力共治”和北京市中关村的“士绅熵治”等，做了深入调查和系统研究。

我在深入研读了社会共治的杭州经验和温州经验后，有一个感觉，这两篇实证研究报告都很接地气、又各具特色，反映了我国一些地方和基层在摸着石头过河的社会共治实践中各具地方特色的创新和创造。这是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学者们真正沉到社会实践中去，做了大量现场观察、亲身体验之后，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以后写出来的。相信陆续完成的后续研究报告也会体现这样的特色和优势。为做好进一步完善充实的工作，我提出四个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第一，希望课题组在既有研究基础上能够拓宽视野，关注我国广大农村的社会共治问题并开展较为深入的研究，尽快形成研究报告。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越来越走向空心化、人户分离化的我国广大农村，在社会治理特别是社会共治方面面临许多新的挑战和问题。比如，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梁鸿教授在报告文学《中国在梁庄》中对此有所反映。建议课题组考虑，可不可以再做一把努力，补上农村社会公共治理的实践案例。这样，覆盖面会更广，指导性会更强。

第二，希望课题组关注目前我国不少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中普遍存在的“城中村”和“村改居”社区的案例，对其中社会共治的创新实践有所挖掘和提炼，将其纳入系列研究报告中。这方面，近年一些影视作品已经有一些零星反映。这两类区域是当前我国社会治理的难点和盲点，希望能够加大力度开展深入的实证研究并形成研究报告。

第三，在我国经济和社会持续转型过程中，产生了许多新的公共领域，出现了不少新的公共事件，也由此出现了许多新的公共治理需求。比如在2014年围绕广西玉林狗肉节出现的“吃狗派”与“爱狗派”的舆论大战。再比如围绕广场舞大妈在国内外广场上的劲歌劲舞，在网络媒体和新媒体上出现了许多意见对立的文章和观点。还有，在我国多地出现了盲目反对PX项目落户本地的邻避效应，等等。针对这些新的公共领域、公共事件，目前的治理方式存在哪些问题？如何实施有效的社会共治？国内哪些地方对此已经有了可供参考的案例？建议也能做些实证研究。比如，

PX 项目在我国厦门、大连、宁波、昆明、彭州等多个地方遭遇当地群众抵制反对，酿成不同规模的群体性事件，而福建漳州古雷却成功地接纳了从福建厦门遭遇反对后迁出的 PX 项目。这就是一个很值得深入调研的案例。

第四，要注意防止把国家现代治理和社会共治同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割裂开来。在地方案例的实证研究中，比如温州的社会共治研究报告，在讲到政府与社会、政府与社区、政府与社会组织、政府与社工自愿者组织如何在社会共治中通力合作时，没有讲党的领导在社会共治中的作用。这是一个必须加以弥补的缺陷。杭州的实证研究报告强调了社会共治的核心是党政领导。中央在前些年提出的“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以及十八大报告、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和“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的一系列论述中，都强调要发挥党的领导在国家现代治理和改进社会治理中的核心作用和团结、组织、激励、鼓舞、推动作用。这是中国特色现代治理的一个重要特色，是现代社会共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大要素。建议在系列研究报告中都要注意这个问题。

以上意见和建议，供课题组的同志们参考。

施芝鸿

2014 年 10 月 20 日

（现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现任全国政协社会与法制委员会副主任。）

序 言

国翰将完成的书稿寄来已多日，出版社一再催促，原拟邀征宇同志对话的这个序言只好作罢，改为由我代笔。其实在我案头，有年初访杭期间在湖畔居我们对话的录音整理，当时整整一下午，谈的都是这个主题，一直以为能够用在书中，却因缺少调研和成书后的情境，只好忍痛割爱。也罢，借书稿付梓之际，我确有许多话想说，也整理一下多年来在征宇同志支持下赴杭调研的体会，特别是我们多次对话的心得，算我这多年来调研对朋友们的汇报，也权做给国翰的序言。

说起来，国翰做我的学生已16年。他和建宇俩人，是我招收的第一批硕士研究生，算得上是“名门之后”的开门弟子了。1998年初夏，我从日本回国到清华任教，不久他们来到我的门下，一起组织了国内第一个NGO学术研讨会并成立了NGO研究中心。我们师生成为清华NGO筚路蓝缕的创业者。在那难忘的日子里，我们一起调研，一起读书，一起在我位于清华园宿舍的客厅里激烈论争，一起拨通一个又一个从北京黄页簿上查到的社团电话探寻问卷下落，也一起去北戴河统稿、去长城春游，这个来自湖北农村的年轻人勤勉、包容、率真而略显腼腆，每遇陌生人或在公开场合讲话都会脸红害羞，但一讨论问题则不顾一切坚持己见，往往争论得面红耳赤，他会为了一个观点遍查文献、引经据典，直到搞清楚为止。1999年夏天，我们在友谊宾馆举办首届NGO国际研讨会，他和建宇是会务骨干，天天通宵达旦，忙里忙外，从头至尾，当送走了所有外宾，他们靠着沙发睡着了，我才知道他们已多日未眠。3年的硕士生涯很快结束，建宇赴港中文读博，他暂时留在NGO研究所担任我的助理。没多久，我推荐他去东京工业大学桥爪研究室攻读博士学位。桥爪教授是我的知交，社会理工学科的奠基人和日本著名社会学家，国翰在桥爪研究室读博期间我几乎每年

都有机会去东工大，一聚会，一聊天，聚的是学业事业，会的是师生亲情，走近的则是心灵关切。

转眼，他博士毕业回国到杭州任教。我借调研的余暇邀他在西湖边小聚，谈到研究方向，他依旧的 NGO 情结令我倍感欣慰，邀他参加清华 NGO 研究团队。这个曾经以他为骨干的团队如今已枝繁叶茂、今非昔比，他以一个新人姿态加入进来很快就和大家融为一体。他的勤勉、包容、率真不减当年，多年在日留学训练养成的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的学风令大家耳目一新。没多久，他已然又成为清华 NGO 研究团队的骨干之一。

国翰出身理科，有缜密的逻辑思维训练并熟练运用数学等分析工具，在清华读硕期间做了大量实证调研，补充了管理科学工程的学科视角和知识结构，赴日留学期间受到严格的社会理工学熏陶和训练，阅读了大量社会学经典文献并选择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乡村治理作为毕业论文，完成了高水平的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并取得了优异成绩。这些为他回国后重新投身于 NGO 研究特别是致力于社会共治的实证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学科和理论基础。本书是他回国后参与清华 NGO 团队开展实证研究取得的初步成果，体现了他的学术功底和实证训练，也反映了他敏锐的思辨能力和学术创新能力，以及勤勉治学的踏实肯干精神。我为他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一学术专著并取得较好的成果而倍感欣慰，并聊表祝贺。同时也想借机表达对他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希望和期待。希望他在本书研究的基础上能够再接再厉，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在理论思考和实证调研方面取得更大的成绩，期待他有新的著作出版。

二

这本书所讨论的是杭州的社会共治话题。我之所以将杭州定义为社会共治的实践基地，与我对杭州的理解乃至心缘有关。

多年前，我受杭州市委政策研究室之邀来杭调研。在那之前，我的足迹已踏遍大江南北，也多次来杭调研社会组织，比起杭州，我更钟情于温州。但那一次在杭州，我见到了一位博学、健谈且深刻的官员，时任杭州市委副秘书长的征宇同志。他向我介绍了杭州的做法，话题很快切入到对问题的认识乃至思想层面。他对权力、资本、利益集团的剖析令我饶有兴致，他关于社会矛盾、社会资本、社会交往、公共领域等的认知准确清

晰、富有见地，他提出的动员社会精英和多元主体探索社会共治的思路清晰独到、观点犀利，他对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的灵活运用，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深入理解，对当下现实问题的透彻分析，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从那以后，我们成了推心置腹的知友，于调研之余总要寻机畅谈，话题从调研见闻，到天南地北，到所感所悟，到思想乃至精神。身体欠佳的他，诸事繁忙，却几乎每次都有约必至，我们常常相约几位友人畅谈至深夜，任思想的火花迸发，从思想之流中体会当下的实践创新。

我于这样的交流中，渐渐感悟到实践背后思想的力量。我相信杭州实践的背后存在一个丰富的思想过程，在征宇和他的许多同志们之间，在更加广泛的社会交往中存在诸多如哈贝马斯所描述的“公共领域”那样的话语空间和思想场域，存在大量关于当下杭州实践创新的观点交锋、思想论争以及在各个层面所达成的共识，我于是要求我们的团队尽量深入开展访谈，努力从现象的观察进入实践背后的思想过程，理解和把握杭州实践的思想脉络。在这本书中，国翰尝试把握我的意图，无论在概念上、结构上，还是具体的案例选择及分析上，都试图体现这种倾向。其实归根到底，不仅是在杭州的调研，乃至在我们关于社会共治的整个研究中，都深深感悟到实践背后睿智的思想过程。我深信这是中国改革进入全面深化期不可缺少的过程，这也是实践研究如此吸引我的精彩之处。

为此，我由衷地感谢征宇同志，感谢于杭州调研中给我们大量思想启迪的各位智者。本书希望能够成为新的话题之一，更期待引起关注、讨论和批评。

三

社会共治是本书的主题，也是今年清华 NGO 研究团队关注的重心。

这个初现于克强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新概念之所以引起我的强烈共鸣，首先是因为我们在社会治理创新调研中遇到了大量需求和相应的创新实践，如本书所展现的杭州增量共治的实践，也如我们即将出版的一些研究报告中所要展现的其他地方的实践创新。我相信社会共治是中国改革进入全面深化期，地方实践中所遇到的具有很大普遍性的共性问题，也深信在这方面已经和正在形成大量富有地方特色的实践创新，我们的研究尽管挂一漏万，但力求以个案的形式展现地方政府在社会共治方面的实践

探索和创新。

其次，我更强烈的理论关怀在于：我深信社会共治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和经典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实现形式。从上古大禹治水的传说，到西周的分封诸侯，春秋战国的合纵连横，直到清承明制下的满汉共治，社会共治在中华大地源远流长，也渗透在儒家、墨家、法家、道家等治国思想的里里外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社会共治是数千年中国治理实践的经验结晶和思想共识。同时，社会共治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孜孜以求并清晰描述的社会理想，包含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经典社会主义的大量论述中，尽管后来在苏联和中国等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革命实践中阶级专政取代了社会共治，使这一思想被长期湮没，但在战后欧洲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包括转型后的俄罗斯近 20 多年的拨乱反正中，马恩的社会共治思想重新引起关注。

我们关于社会共治的理论探索和研究，努力尝试连接中国传统文化和经典社会主义的两个思想脉络，并在当下地方政府实践创新的基础上总结提高，试图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共治理论。本书也是这种理论关怀的初步探索和尝试，不揣粗糙，以就教于学界。我们相关的研究成果将陆续发表出来。

本书和后续出版的关于社会共治的研究成果，得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总社谢寿光社长和分社王菲社长、骁军主编一如既往鼎力相助，使得我们的成果能够精彩呈现，在此深致谢忱。

以上约略表达我对国翰书稿、杭州调研及社会共治研究的情结，也请读者更多关注清华 NGO 研究团队系列成果的后续出版。是为序。

王名

2014 年 10 月 22 日

目 录

contents

绪章 社会共治话语中的增量共治	001
0.1 对于善治的追求	001
0.2 增量创新的路径	004
0.3 杭州的日常生活	006
0.4 杭州的社会管理	008
0.5 研究方法和思路	009

实践篇

第一章 民主民生：追求“仁”的城市德行	013
1.1 善治的评价标准	013
1.2 杭州社会治理的发展历程	016
1.3 杭州的社会治理项目	019
1.4 杭州社会治理创新的突破点	022
第二章 共建共享：富于“义”的城市胸怀	026
2.1 让谁来治理？	026
2.2 传统的社会治理主体与新型社会治理主体	028
2.3 新型社会组织的特征	032
2.4 杭州的社会复合主体	034
2.5 社会复合主体的控制机制	038
2.6 社会复合主体的作用机制	040
2.7 企业参与社会治理	045

2.8	新型社会组织发展的内在逻辑·····	050
2.9	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发展方向·····	052
第三章	同心同意：倡导“理”的城市精神 ·····	056
3.1	城市治理的精神特质·····	056
3.2	城市治理理念的来源·····	057
3.3	价值观的现代性追求·····	059
3.4	政府的社会治理理念·····	062
第四章	协商协行，践行“智”的治理之道 ·····	066
4.1	有智慧的治理·····	066
4.2	新型治理平台·····	069
4.3	新型治理关系·····	071
4.4	新型治理结构·····	072
4.5	社会复合主体的内部结构·····	074
4.6	新型治理工具·····	078
第五章	高质高效，提升“能”的治理之本 ·····	086
5.1	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出·····	086
5.2	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	088
5.3	社会组织的社会治理能力·····	093
5.4	杭商参与社会治理·····	102
第六章	互联互通，构建“信”的治理之脉 ·····	111
6.1	信任社会·····	111
6.2	历史传统与地域文化·····	114
6.3	杭州的社会组织·····	116
6.4	杭州的志愿活动·····	119

理论篇

第七章	从治理到共治 ·····	129
7.1	治理和善治出现的时代背景·····	129

7.2	共治范式的变革·····	132
7.3	分类视角下的社会共治·····	136
7.4	社会共治的理论源流·····	140
第八章	多元主体社会共治 ·····	147
8.1	治理主体——多中心治理·····	148
8.2	治理结构——网络化治理·····	151
8.3	治理机制——协同治理·····	155
8.4	治理关系——新公共管理、新统合主义·····	156
8.5	治理过程——协商治理、动态治理·····	159
8.6	发达国家社会共治的案例·····	160
第九章	增量共治的实践和理论思考 ·····	165
9.1	社会共治是一场社会变革·····	165
9.2	增量变革·····	168
9.3	柔性变革·····	171
9.4	杭州社会共治的成功因素·····	174
9.5	变革社会管理体制，促进社会多元共治·····	176

案例篇

案例一	西泠印社 ·····	181
一	百年名社——西泠印社·····	181
二	困境与危机·····	182
三	治理与改革·····	182
四	机制与运作·····	183
五	名社重生的启示·····	183
案例二	运河综合保护 ·····	185
一	“京杭大运河”的成功申遗·····	185
二	曾经哭泣的杭州“母亲河”何去何从·····	185
三	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会合力的运河综保治理新机制·····	186

四	运河综保申遗治理的借鉴意义	187
案例三	杭州城市品牌网群	189
一	杭州的城市品牌——生活品质之城	189
二	城市品牌网群的发展历程	189
三	四界联动、“点线面块”结合的组织架构运作	190
四	网群特色与存在问题	192
案例四	“湖滨晴雨”工作室	193
一	“湖滨晴雨”工作室的概况	193
二	“湖滨晴雨”工作室的运行架构	193
三	“湖滨晴雨”成效斐然	194
四	独具特色的基层社区协商治理机制创新	195
五	湖滨晴雨的治理创新思考	195
案例五	我们圆桌会	197
一	《我们圆桌会》的出现	197
二	《我们圆桌会》的内容	197
三	《我们圆桌会》的特点	198
四	《我们圆桌会》带给社会的启示	199
案例六	杭州的市民体验日	200
一	在体验中创造更美好的生活——杭州市民体验日	200
二	杭州市民体验日的活动机制	200
三	杭州市民体验日的活动特色	201
四	杭州市民体验日存在的问题	202
案例七	杭州丝绸女装产业联盟	204
一	丝绸女装产业联盟助力“丝绸之府、女装之都”	204
二	多元互动，助推行业联盟增活力	205
三	多力融合帮助行业联盟提效力	205
案例八	绿色浙江	207
一	绿色浙江的概况	207